



2019年11月16日，约65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出展现法轮大法传世界的美好画面。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翻墙软件获取方法

电脑版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

建议使用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了解更多真相，请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天地苍生

欺世谎言

一百年来
中共编造的谎言
欺骗了四代中国人



2019年11月

特刊

www.minghui.org



揭露中共罪行

欺世谎言

卷首心语

1 谎言与真相

视角

2 瞬间记忆

3 三言二拍

尘封密档

4 《收租院》出笼记

6 恨的陷阱：歌剧《白毛女》

8 “周扒皮”后人：“半夜鸡不叫”

10 “旧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

12 谁才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15 “长征”是逃跑还是北上抗日？

18 南泥湾“大生产”生产了什么？

21 “二号病”的由来

23 “烈士”遗孤：最荒诞的遮羞布

造假机器

26 我们从课本上学到了什么？

28 山东教育出版社持续用
“自焚伪案”欺骗小学生

30 中共操控外媒欺骗世界

走进真相

33 “1400例”谎言报道从何而来？

34 突破封锁的先驱者

掸却封尘

39 新“醒世恒言”

41 三退保平安

www.minghui.org



三退保平安

退党、团、队方法

● 热线电话:

美国: 001-702-873-1734, 001-866-697-6570, 001-858-609-9088

加拿大: 001-416-361-9895, 001-514-342-1023, 001-604-276-2569

● 海外传真:

001-201-625-6301, 001-510-372-0176

●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网页投稿:

大纪元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海内外三退人士，化名同样有效。

2月10日发表声明的李一这样说到：“我是当年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当过红卫兵、插过队、回城待过业、当过临时工。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让中共的运动给毁了，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把中国人民彻底解脱。我在此郑重声明：退出当年被哄骗加入的少先队、共青团！”

来自云南蒙自的王尧说：“因幼时接受了邪灵的蛊惑，变得狂躁，在网上不停地针对抗共义士进行攻击，但是偶然有一天我不小心看到了《九评共产党》，遂感到豁然开朗，之后翻墙更对我原有认知产生了颠覆性的作用。我的后

悔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特此声明三退以表达我对自己失去的几十年的弥补。”

来自深圳的李峰称：“到了美国后才真正的了解到许多真相，后来又目睹了国内共匪党打压法轮功学员，我父亲手下一名护士在被绑架两个月后折磨到半身不遂……我很庆幸我没有入党，可是中小学期间加入过少先队，在此郑重声明退出少先队！”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很多高层官员都选择

“三退”，正像有60年党龄的退休干部李国民所说：“退出这个共产党恶魔邪教组织，干干净净地过日子。”

天



谎言与真相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中国的正史，被称为“信史”，后人可凭借史实品评中华道统的真谛，圣贤的品德令人仰止，奸邪的诡诈让人唏嘘。

无论是哪一朝哪一代，中华文化都是在儒释道交替相映的普世价值中，阐释着真诚、善良、仁慈的现实意义与内涵宗旨。正是这样的内在力量化育了华夏子民，对于生命意义，有了一种深沉的期待。

五千文明，文字未变，道统长存，文化悠悠。

然而，百年红祸、西来幽灵带来了一场持久、深重、系统的浩劫，文字被简化，历史被篡改，圣贤被亵渎，私利替代仁义，谎言围剿诚信。

在现如今的报纸、电视等传媒中，从来没有承认错误这一说，再大的过失都能成为中共粉饰自己的画皮。人们这样形容现在的媒体：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华夏子民在中共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合围之下，思维被钳制，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冰封。从牙牙学语时的所看所听，到背起书包步入学校，直到工作、成家，我们看到的报纸、电影、电视、课本，无不是经过精心编造、刻意装饰的“伟、光、正”篇章。

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谎言像纸包不住火一样，终究有化为灰烬的一天。那正是正气回升、真相复明、人心归正的时刻！

《天地苍生》编辑部



袁世凯时期的诸多报纸

107 年前的言论自由

1912年，中华民国问世，《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上称袁世凯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世凯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

袁世凯死后一个月，段祺瑞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利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报禁，正是由于段祺瑞对言论自由采取宽容和豁达态度，使得北洋政府时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灿烂时期。

要么闭嘴，要么蹲在监狱

1949年后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没死，活到现在会怎样？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他要么自己乖乖闭嘴，要么会蹲在监狱里面把嘴闭上。”

《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被中共捧为敢于批评政府、权威、传统的“斗士”。1949年之前，鲁迅批评甚至是谩骂国民政府的文章，可以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自由发表。但鲁迅对此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把国民政府给予的宽大和自由称为“伪自由”。

1949年后的大陆，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任何不满言论都会引祸上身。自由和不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的对比，在此一清二楚。



申报馆

新“醒世恒言”

编辑 甄言

在中共的互联网大墙之外，每天都有一个又一个发自肺腑的“醒世恒言”，永远驻留在了“三退”网站的网页上。在这里，没有五毛，没有监控，没有强制，人们可以自由而无拘束地道出自己的心声。

2019年2月1日发表声明的聂吾明称：“禁锢思想，无法禁锢我的灵魂。一个只会禁锢思想的党派，就不会是一个得民心的统治者，从小所受的洗脑教育，让人蒙蔽了双眼，我了解了它的邪恶本质后，决心退党，以免在有生之年，对不起自己的灵魂。”

世人在觉醒，时至今日，已有3.4亿人在大纪元三退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在三退时的留言耐人寻味。

一位化名“学历”的警察在2019年1月8日的声明中称：“我是派出所的员警，开始的时候也跟着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可是后来我看到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而且是极其残忍的对待他们，我真看不下去，却又无能为力。我就泡病号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就办了病退。今天听了大法弟子给我讲了大法真相，我彻底明白了原来中共邪党的根就是魔鬼撒旦，

反天反地反神佛反人性。中国人都被邪党给欺骗了，我坚决退出邪党的党、团、队一切邪恶组织。”

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张晓梅也是一名员警，她在2018年11月11日的三退声明中称：“我接触过几个法轮功学员，个个都那么善良；而我接触的领导和政府官员都那么唯利是图。现在扫黑，是共产恶党的流氓文化，把好人培养坏了，把坏人培养的更坏了。不是政匪一家、警匪一家，哪有黑恶势力！中共恶党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迫害好人的一定是邪恶的。所以，中共恶党不除，人民不会安居乐业。我退出邪恶中共党、团、队组织。”

中共建政七十年运动不停，灾难不断，多少家庭遭受摧残。很多人从家族的经历、个人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中共的残暴，或从《九评共产党》、大纪元网站等了解到真相，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已被迫害得脱相，吐字说话都很困难，医院确诊为尿毒症，公安医院和吉林市中心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

10月21日，监狱通知了家属。刘成军已奄奄一息，却顿顿地说：“啥……也……别……执……着。”大姐也同样是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他看着大姐在流泪，就一个字一个字地鼓励她……

12月26日凌晨4点，经过21个月的炼狱摧残，高洁的刘成军离开了人世，年仅32岁。当天，监狱纠集大批警察，不顾家属反对，未经尸检，强行火化。

梁振兴 四个监狱轮番迫害

故事的结尾，我们回到团队主帅梁振兴身上。开头讲到：梁振兴在插播的前几天被诱捕，在看守所里被刑讯逼供，他承受着酷刑，为团队争取着宝贵的时间。

插播之后，警察不断地长时间提审梁振兴，每次他都是伤痕累累地被抬回来。

在法庭上，他看到了他残缺的团队。通过大家互相鼓励的眼神和法庭的质证，他才知道大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是令他最欣慰的。

2002年11月，被冤判19年的他，被押进吉林省第二监狱（俗称吉林监狱）。如今已经至少整死20人，另有几十人致残、致疯。

吉林监狱、长春铁北监狱、四平石岭监狱、公主岭监狱，在四个监狱的辗转中，梁振兴受尽了人间酷刑，右眼几乎失明，肺严重病变，脚肿得象馒头，痛苦得直咬牙……2010年5月1日上午，铁骨铮铮的梁振兴停止了呼吸，年仅46岁。

对梁振兴的死，西方媒体这样报道：“带领发明网络信息自由才能的人死在中国，他的死就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一样，在历史的记录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法轮功发言人张和平（右）代表刘成军接受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的“丹心汗青奖”

一堂小学语文课看谎言的“包围圈”

作者 清音

一堂小学语文课上，孩子们是怎么讨论“王二小”的……

我是个小学语文老师。过去，我和现在的老师一样，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根本不去作善恶对错的分析，甚至跟着不正确的理念起哄。但是，当我有契机穿越“红墙”，获知自己从未了解的真相时，独立思考的光芒也照射进我的心扉和我的课堂。我知道用正理去分析问题了，教学方法也大有改进，真的能使学生受益。

比如，在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王二小》，里面有一段是说，王二小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八路军的枪声，敌人急了，抓住王二小，用长长的刺刀，杀害了他。

我在上这篇课文时，先范读一遍，有意把“突然”这个词读得突出些，给学生起些暗示作用。学生在读的过程中，特别会模仿老师的读法，也把这个词读得较重。读完后，我问学生：小朋友，本篇课文你读懂了什么呢？对本篇课文，你有没有疑问呢？

没想到这一问，几乎一半的学生“唰”一下，高高地举起小手。

学生A站起来说：我有大疑问，王二小不是帮八路军办事吗？八路军为什么要突然开枪，为什么不让王二小离敌人远点再打呢？

学生B：敌人不是已经进了包围圈吗？急什么要突然开枪？

学生C：一点都不管别人的死活，还是对待自己国家的人，一点都不善！

学生D：突然开枪，王二小离敌人最近，又是一个孩子怎么躲开呢？好可怜哦！

另一个爱动脑的学生说：但愿这事是假的就好了。

是啊，出于对王二小的同情，我们但愿是假的。事实上，在中共编写的教材中，多是粉饰、歌颂中共的造假宣传，又有多少是真的呢？如果教师照本宣科，不去用心分析，真的会把学生带到中共谎言的“包围圈”了，孩子们怎么会逃离“王二小”一样的结果呢？

"万恶的旧社会"？

在中国大陆人的观念里，中国被分成了“新中国”与“旧中国”，中共凭借着掌控报刊、影视、舆论，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描述为暗无天日。从被动到主动，从陌生到熟悉，从无意识别到下意识，经年累月，“万恶的旧社会”就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成了被仇视、被声讨的对象。一提起“万恶的旧社会”，人们无不打心眼里仇恨或厌恶。

《收租院》出笼记

作者 周宇新 大纪元 / 编辑 山河

《收租院》泥塑使“恶霸地主刘文彩”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坏人。

1965年初，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摆出了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泥塑《收租院》，“控诉”地主刘文彩剥削农民的种种“恶行”，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分泥塑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新闻界关注。中央电视台赴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记录片《收租院》，大获中共青睐，解说词也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舞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坏人。

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陈列馆接待观众达500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

当年，陈列馆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水牢”。据说冷月英是唯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但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彩

大的变化，酒不喝了，烟不抽了，大事小事时时处处都为别人着想。刘成军主动接替了梁振兴，挑起了大梁。

插播成功了，长春民众的心中豁然明亮。

插播当晚，军队开进长春戒严！警察全部出动，开始了大搜捕。每个警察都有抓人指标，完不成就下岗，相关领导撤职。抓法轮功（学员）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据警察讲：“上级有令，杀人放火都不管，就抓法轮功（学员）。”

第一轮搜捕，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都被警察刑讯逼供，逼迫他们交待插播的线索。

3月23日晚，20余辆警车包围了前郭县山后屯，一群恶警象土匪一样闯入刘成军的姨父柳长发家。把刘成军的表弟带到派出所毒打了一个多小时，威胁要把他84岁的姥姥抓来，这样逼着问出了刘成军的下落。

凌晨1点多，公安部督办、省厅指挥的专案组，杀向山后屯，7辆警车包围了柳家，点燃了柳家的两个柴草垛。藏在里边的刘成军跑了出来，多处被烧伤，恶警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碗口粗的大棒一顿暴打，然后砸上镣铐，松

原恶警李伯武（音）往刘成军腿上连开两枪，叫嚣着：“这回我看你往哪跑！”然后把刘成军塞进小车后备箱。

监狱的摧残

刘成军被关进了吉林省第二监狱（俗称吉林监狱）一大队。他被拖到水房，臀部被打得肿得很高、溃烂，连短裤都脱不下来了，木板木棍被打折了好几根。用手编腰带抽脸、抽眼睛，腰带上的大纽扣都打碎了……目击者（刑事犯）佩服地说：“刘成军真是一条硬汉，被打时一声不吭。”

2003年8月底，刘成军绝食10天，滴水未进，已经远远超过了绝食绝水7天即死的极限。他



中新网2002年4月1日的图片表明：关押刘成军的房间内血迹斑斑，他显然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

了大抓捕，报纸、网络、电台、电视开始全面攻击法轮功，抛出了一個个惊人的污蔑法轮功的案例。

2001年底，因去北京上访，被劳教期满回家的梁振兴，在明慧网上看到了纪录片《伪火》。严谨的剖析、无可辩驳的证据，让梁振兴心里久久难以平抑，民众太需要了解这个真相了。

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让梁振兴豁然开朗。文中提到截断电视传输，将VCD机接入线路播放真相节目的可行性——这就是他找到的最有效的方式，比以前的小喇叭广播、真相气球和海量传单更有效！

用这种全新的方式揭露这个世纪谎言，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

梁振兴马不停蹄，去和长春功友们交流想法，寻觅人才。当时52岁的周润君也萌生了插播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这位大姐把自己租的一处毛坯房作为基地，也去帮着组建团队。

32岁的刘伟明，是有线网络电视的专业人员，精通电子技术，他毫不犹豫地来做技术攻关。

一个个精英纷至沓来，组成了一个18人左右的团队。团队有五位技术主力，这“五虎上将”除了上述4人，至今还有一位不知道名字，也许就在那些在抓捕中被整死的无辜者中。

上将”除了上述4人，至今还有一位不知道名字，也许就在那些在抓捕中被整死的无辜者中。

在插播团队逐渐成型之时，磨难又至，2002年2月下旬，梁振兴被诱捕。

主帅落难，然而正义的传播，却没有终点。

接任者刘成军

刘成军，是吉林省农安县滨河粮库职工，在成为大法修炼者以前，没人敢惹，1996年开始炼法轮功，随后他的身心都有了很

28岁的张闻，是精干的电工，他和刘伟明一起绘制了有线电视网络图。

26岁的雷明是团队的小兄弟，他来自白山市。他是快餐师，双手灵巧，还有着运动员般的身法。

31岁的李德海是通化市人，他家是养牛的，正在给他攒钱结婚。他因为讲真相被警察追捕，流亡到长春。

一个个精英纷至沓来，组成了一个18人左右的团队。团队有五位技术主力，这“五虎上将”除了上述4人，至今还有一位不知道名字，也许就在那些在抓捕中被整死的无辜者中。



当年民兵参观《收租院》，“义愤填膺”。

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物证一个也没找到。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

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方案。得到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按设想“布景”。

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照搬1954年制作的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原本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事实上，刘文彩非但不是恶霸，还是老百姓眼中扶困济危、慈善办学、兴修水利、开路架桥的大善人。

1949年前，刘文彩捐地两千多亩，兴办文彩中学，并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教训中刘文彩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是老百姓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称：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天

恨的陷阱：歌剧《白毛女》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一部《白毛女》歌剧，让很多中国人陷入了仇恨的陷阱。



中共宣传《白毛女》煽动仇恨的连环画

很多人并不知晓，中共是出于推动土改运动，革地主命的需要，虚构了歌剧《白毛女》，颠倒黑白，煽动民众对地主的仇恨。

从“白毛仙姑”到“白毛女”

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民间传说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法力无边的白毛仙姑。她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因为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都信奉、供养她，使得中共的很多政治斗争运动在当地难以开展。

中共政治文人邵子南，根据这一传说创造了《白毛女》故事

雏形，主题却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目的是想把村民们从对仙姑庙的敬仙拜灵中拉到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中来。

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院院长周扬指示一些人，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向中共七大“献礼”。

歌剧《白毛女》的主要内容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映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了，土改“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

显而易见，《白毛女》剧本实质就是中共歌剧版政治白皮书。



梁振兴

刘成军

刘海波

侯明凯

雷明

2002年3月5日晚7点19分，长春市惊愕了、沸腾了。

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同步播出了《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等真相节目，震惊的人们纷纷电话告诉亲友同事，让他们打开电视看真相。

40分钟过去，45分钟过去，50分钟过去，数十万的人们如梦方醒——燃起人们仇恨的那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竟然是场“伪火”，那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似乎已经被烧得口鼻歪斜，可夹在双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打破常识的编剧拙劣不堪，漏洞百出，这是“央视出品”的一贯风格。

电视插播的壮举，让人振奋，明白真相的觉醒，让人感动。人们沉浸于此，未遑计算真相的代价。

中共为真相大白而狂怒，恼羞成怒的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公安部副部长刘京赶往

长春限期破案。从开始于这天夜里的长达一年的大搜捕中，长春地区5000多名法轮功修炼人被抓捕，15位直接参与插播的勇士被判4~20年的重刑，至少8人已被酷刑虐杀，余者尚在中共监狱中受折磨。

17个冬天走过，17个春天来过，全世界传遍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梁振兴、刘成军、刘海波、周润君、侯明凯、雷明……

梁振兴团队

穿越红墙的想法出自梁振兴。

梁振兴，1964年出生，吉林省长春人。九十年代，就已经拥有几十万元个人资产，阔绰的生活，社会的污染，使他沾染了一些恶习，以致家庭不和，面临破裂。1998年学炼法轮功以后，他浪子回头，改掉了花天酒地的恶习，濒临破裂的家庭重归于好。

1999年7月20日，全国开始



突破封锁的先驱者

编辑 山河

坚忍不屈的精神
Kathleen Gillis
油画 2004年

《白毛女》在中共占领区上演后，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信以为真，充满对“旧”社会的仇恨，对地主的仇恨。尽管人们在自己身边并没有看到什么“黄世仁”和“喜儿”。

1949年中共建政后，电影、京剧、芭蕾舞剧等艺术形式的《白毛女》铺天盖地，整整欺骗了中国几代人。就这样，谎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不知不觉被人们普遍接受。

黄世仁是大善人

大陆记者曾在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考察后发现，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40岁时买下了15亩薄田。他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独生子黄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经营有方，扩大了祖业。他育有五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仁、义、礼、智、信。

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黄世仁是长子，继承父业。他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是当地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儿



《白毛女》剧照：斧劈积善堂

女成群，家庭和睦。

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洪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不耐辛劳，赌毒成瘾，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黄世仁后来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还债，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最终杨白劳因外出躲债时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厚葬杨白劳后将喜儿抚养成人。

结语

《白毛女》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进行艺术创作，出自于中共煽动仇恨的党性需求和斗争原则。党性即狼性，谎言终将一个个被揭穿。

半夜鸡不叫

揭开地主周扒皮的真实面目
半夜鸡叫的故事曾经蒙蔽了几代中国人，这件事的真相该让知道了。



<http://neiguanhe.blog.163.com>

“周扒皮”后人： “半夜鸡不叫”

编辑 甄言

地主“周扒皮”(原名周春富)无视漆黑的深夜不适合劳作的事实，每天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这个中共编造的颠覆了基本常识的谎言居然欺骗了几代中国人。

2009年，“周扒皮”曾外孙孟令騫出版的《半夜鸡不叫》还原了历史真相。

文盲高玉宝与《高玉宝》真实作者

孟令騫考证，据周春富三儿子周长义回忆，周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1963年高玉宝特意来到周长义家，反复强调“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给周春富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的儿子揭示，他从来没听父亲唠叨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高玉宝回乡做报告，毛泽东是他后台。

高玉宝1948年加入中共军队，是个文盲，靠画字来表达意思，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国文称其为“描红作家”。

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上，署名“荒草”的作者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四川资阳人，1940年到延安，创作大生产歌剧《张治国》，受到毛泽东称赞。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1993年病死。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资阳史志研究作家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2008年10月，王洪林应孟令騫恳求，去重庆探访过郭永江后人，揭秘了“周扒皮”的创作

“1400例”谎言报道从何而来？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之初，抛出了“1400例”假新闻，抹黑法轮功，为这场迫害运动造势。这些谎言如何出笼的呢？

教唆杀人犯污蔑法轮功

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个叫张清贺的工人，患贫血、神经衰弱及其它慢性疾病，医生开方后，他自己拿去配药，因不懂药理，服药后处于意识不清、不能自制的状态。一天他服完自制药后出现自杀征兆，母亲和妹妹前去劝阻，反被他杀伤。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分局收审张清贺后，多次逼迫他承认炼过法轮功，并威逼利诱他栽赃法轮功，说这样能够不被判刑。

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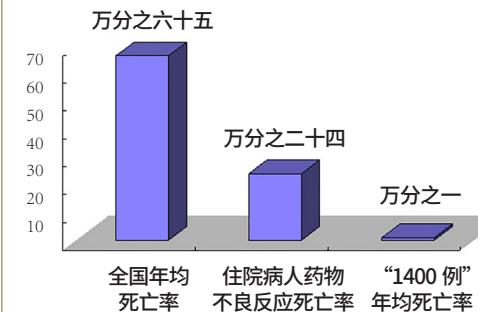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200元钱。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

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

中共造假“1400例”反证法轮功祛病奇效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提供的数字，全国正常年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五。即便拿中共造假的“1400例”来算，按照中共迫害开始时宣称的仅有二百万人炼法轮功（实际近一亿人），从1992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死亡200人，也就是说年均死亡率仅有万分之一，远远低于正常人口死亡率及住院病人死亡率。这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卓越功效。

天



提升道德，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要想镇压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目的的修炼团体，江泽民最缺乏的就是合法性和群众基础。为了强奸民意和混淆视听，江泽民动用了全部国家宣传机器，不遗余力、从不间断地编造谎言，诋毁攻击法轮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贯彻江泽民的意图，2003年联合中共中央25个部门建立“对外宣传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加强外宣的渗透力度。

江泽民的“对外宣传要打主动仗，先声夺人，强调新闻时效”的命令在“天安门自焚案”、“京城血案”、“浙江乞丐毒杀案”等恶性栽赃陷害法轮功案件的对外报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和发挥。

2000年5月26日CCTV的《焦点访谈》播出了18分钟攻击法轮功的特别节目。中央“六一零办公室”负责人审看节目后要求CCTV把节目翻录成录像带送海外使馆，同时译成英文对外播出。中共不仅用假新闻来毒害中国人，还企图欺骗全世界，当时不少海外华文媒体跟着中共诽谤法轮功。

尽管中共花大力气进行红色

渗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清醒。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强烈谴责中国（共）的军事侵略、盗取商业机密、各种间谍活动、侵犯人权，以及干预美国选举等行为，显然将使中共的大外宣不能再象以往一样无所顾忌，也难以达到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

随着大外宣计划曝光，美国已正式要求中共海外大外宣机构都要注册成“外国代理人”，这种制裁既将其暴露于光天化日，又限制了其渗透恶行，更深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终于看清了披着“改革”外衣的中共及其邪恶的终极目的。
天



美国副总统彭斯强力谴责中共

过程。

1950年代初，全军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用画字方式写自传，表现积极，被放大为典型，中共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写作。要煽动起对“旧社会”与地主的仇恨，就要表现“真实”：真名真姓真地点。至于半夜学鸡叫，郭永江子女说其父晚年讲过，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郭永江无法修改，最后在中共授意下干脆代笔。每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共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

号称作家的高玉宝，其一生也只出版过这么一部《高玉宝》。



《解放军画报》(总第16期)刊登的荒草帮助高玉宝修改文章的照片
天

“周扒皮”一生勤恳，惨死中共土改运动

2006年，在周春富家乡瓦房店阎店乡，时年92岁的高殿荣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阎振明老人说：“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周春富是靠勤俭置换来的土地，“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当年的长工王义帧说：“周春富对家人很抠，对伙计还行。”

老人们说，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周春富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了。

“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人被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

文革中，周家长工孔兆明被革委会主任请上台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孔兆明不自主地说，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赶快拉他下来。

中共的土改，颠覆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乡绅自治体系，为挑起仇恨、斗争而炮制的谎言至今仍在毒害着中国人。
天

“旧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

作者 真言 大纪元 / 编辑 山河

“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在中国大陆，一提到“旧社会”，人们马上联想到“贫穷、落后、没文化、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等等词汇。果真如此吗？

1949年之前，军阀之间的割据、争夺地盘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军阀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于当地经济、教育是维护发展的，否则何以维持这一方水土呢？

北洋政府时期，仍有内战；国民政府时期，内有悍匪战乱、外有强敌入侵。但这两个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是得到保障的。除了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传出局部饥荒，中华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人

民的温饱并不成问题。

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讲师200—26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工人为10—40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1/5。

可资证明人民生活有着正常基准的一个标志是人口的增加：从1911年的4.1亿人（四万万同



1937年冬，上海钟表匠一家合影。

体发声。比如《中国日报》付费插页，将内容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的纸本以及电子报上，这种借主流媒体的声誉、推销自己的私货，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而中共对海外媒体的审查，通常通过四种渠道来实施：直接行动、经济上“胡萝卜+大棒”、间接压力（用广告或外国政府身份施压）、网络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对外国媒体，如果在中国境内运作，以不给更新记者或员工签证等行为要挟就范，而在境外采取给资深编辑施压，要求撤下文章或取消合作。

据一位中国前外交官介绍，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修炼者、民主人士以及支持台湾独立的五类人士是中共海外的重点打压群体。很多情况下，这些团体成为



中共网络审查模式为“人机并用”

中共海外审查的焦点，或者是诋毁宣传的对象。而法轮功修炼者建立了自己的媒体，不受中共控制，更是成为中共的眼中钉。

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象一个事物的两方面：要让国内外观众信服党的一言堂宣传，就必须压制国内外所有对共产党黑恶真相的报导，尤其是消除调查报告和批评性评论。所以它一边扶植自己的国有媒体在海外发声，另一边积极压制海外的异议人士，其目的只有一个：为极权中共的全球战略服务。

最邪恶的言论迫害——从国内到国外

今年约50岁的黄潜，曾是广州购书中心职工。2015年初，法轮功学员黄潜在微博上以《越狱档案》刊文，发表了五条名为《古拉格回忆录》的长微博，因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被非法判刑5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黄潜由于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开除公职、劳教3年、判刑4年，历经各种酷刑虐待。这样的声音，中共是绝对禁止发出的。

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后，以“真、善、忍”为准则，祛病健身，

中共操控外媒 欺骗世界

作者 钟声

2009年以来中共决定投入450亿元人民币在全球推广“大外宣计划”，借此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给全世界洗脑。

近年来，海外许多人对中共的“大外宣”了解得越来越多，认识得越来越深刻。

“在外扩张、对内严控”的媒体政策

先是大幅增加对央视、新华社等中共喉舌在海外的投资，新华社在时代广场竖立起巨型广告牌，《中国日报》报箱出现在美国大城市街头，央视在美国成立中国全球电视网络（CGTN），进入美国的有线电视网。如今新华社派驻全球各国的记者约6000人，其雇员规模将超过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老牌通讯社。

其次是拉拢或控制海外华文



包裹着华丽外衣的中共“大外宣”

媒体。美国独立非营利机构詹姆斯通基金会2001年就发表了《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披露中共主要运用四个策略来掌控美国的中文媒体：以全资或拥有主要股份的形式直接控制报纸、电视、无线广播；政府利用独立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来影响这些媒体；购买广播时段或广告空间；安排中共自己的人到独立媒体工作，在内部起作用。

路透社的调查证实，全球四大洲14个国家发现了至少33座广播电台由中共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控股，或进行节目租赁。

三是借船出海，即借主流媒

胞），增加到1936年的5.3亿和1949年的5.4亿。

当时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早在1916年10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指标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5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东北大学是160万元。

诚如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



民国时期女学生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名师荟萃，左起：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萧蘧，叶企荪，萨本铁，周培源。

长施密德特所言：“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帮助救援，但遭中共拒绝，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真正的原因是：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80%的房屋垮塌，结古镇附近的西航村99%民房倒塌，整个村落夷为平地。倒塌的全是土坯房，连一块砖都没有！中共建政60年了，一再吹嘘“盛世”，百姓连砖房都盖不起，而且不是一个村两个村的问题，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如果外国人来了，一路走来，满目荒凉，让人以为是时光倒流，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所以就不许他们进来。至于百姓的死活那都不重要！

谁才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作者 武德山 大纪元 / 编辑 山河

中共一向自称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真相真的如此吗？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90%以上的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



1937年，这张国民党士兵肖像成为当年《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决心，赢得了广泛支持。

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

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

是特殊材料做的？

镜头事后“补拍”

2002年初，在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自焚”案的参与者记者李玉强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当法轮功学员质问：“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面对铁证，她只好吐露了实情：“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事后‘补拍’的。”她还辩解道：“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

突发事件 镜头却稳定清晰

“自焚”是突发事件，但央视拍摄的镜头却是水平移动的，而且王进东喊口号的声音非常清晰，说明摄像机可以录音。现实是，2001年时的监控摄像头还没有跟踪拍摄及录音功能。显然，是事先安排的专业人员在操作，才使录影稳定清晰，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

早在2001年8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在联合国会议上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指



CCTV的自焚节目中，能看到一名背摄影包的男子，在天安门广场的军警中间自由行走、拍摄。

控该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说：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当时，参会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在1990年代初，曾被官方媒体大力推广。但几年后，由于其广泛受欢迎程度，以及修炼者敬天重德等理念与共产党无神论斗争意识相驳，1999年7月，中共禁止人们修炼法轮功，并发起了残酷迫害。

中共为制造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给镇压找借口，谎言和诬蔑就成了其栽赃的主要手段，“天安门自焚”是最为典型、也是毒害百姓最深的一例。

山东教育出版社持续用“自焚伪案”欺骗小学生

作者 穆清 《大纪元时报》 / 编辑 晓慧

“非圣书，屏勿视”，古人留下警言，不能让孩子受不良信息污染。今天的教育者更不应为政治目的灌输谎言，因其“蔽聪明，坏心志”。

据悉，近日山东教育出版社持续利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毒害涉世未深的小学生，自焚伪案的内容被编入小学教科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明白真相的老师们，已经公开在课堂上把“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的真相讲给学生，使很多学生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骗人的。”

2001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自焚”之火，中共对全世界宣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由于破绽百出，十八年来，不断被海内外各方揭露为“伪造”。

500度高温坐如钟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500多度。且不说这是500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人将手伸进100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可“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坐得稳如泰山。

有观众称：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能让人烫得跳起。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又蹦又跳啦。歇着去吧！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

500度高温塑料瓶不化

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

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



两腿间的塑料瓶翠绿如新

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

1938年9月29日，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亿人民，

拥有陆军270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万人马，1万3千条枪，3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2万红军如何能主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1929~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名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的35%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年：要日蒋火拼，中



1937年，淞沪抗战前的第88德械师。精锐德械“两师一总队”3万精兵在抗战一开始壮烈牺牲。



中央军校毕业的约25000名军官中，有10000名牺牲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4个月。

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鸦片，派潘汉年与日伪勾结、合作，联日抗蒋，通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阵亡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而国民党方面却有206人。

最后，从历史传承上讲，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

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再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

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够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

天



首都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它的发动，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弯路。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

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删除了旧版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把有关文革的内容与旧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对于文革原因，旧版教材中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教材中删改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革一章的旧有标题“动乱和灾难”也被删除。论述文革影响时，新版教材还添加了一个新说法，所谓“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表示：

“我想它（这个变动）是比较险恶的。连中共自己都承认这是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文革。现在它就把文革给淡化了，实际

在淡化什么？在淡化中共的罪恶。完全是歪曲、捏造事实。”

课本造假

在我们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就被告知，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是革命英雄，从小被灌输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我们不曾怀疑教科书的权威性，曾相信书上讲的都是真的，不知不觉中被谎言所蒙蔽。

对于极权统治者来说，教育系统是见效最快、效果最好的洗脑渠道，因为它是系统设计、彻底执行和广泛覆盖的。

语文课的重点不是帮助学生提升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而是通过很多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灌输“中心思想”和革命主义情怀；历史课程则成为中共美化自己，妖魔化国民政府以及西方社会的工具，它歌颂中国的农民起义，美化中共的发家史，掩盖自身政权的不合法性；至于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更是彻彻底底的洗脑。

然而当真相一点一滴被揭开时，人们不禁唏嘘，怎么什么都是假的？历史可能会一时被雾霾遮掩，然而历史不会永远沉睡。

天

我们 从课本上学到了什么？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晓慧

对于极权统治者来说，教育系统是见效最快、效果最好的洗脑渠道。

学生告密，老师下岗，曾几何时，崇尚学问、究竟道理的学堂却成了绞杀人性、泯灭良知的地方。

不到6年时间，30多位大学教授先后丢职，从华东师大张雪忠、北师大史杰鹏，到贵州大学杨绍政、厦门大学尤盛东；从北京建工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桔红，到重庆师大谭松、北京清华大学许章润，大学教授接二连三地被下课，很多人是被学生告密而受到处理的。

文革告密风再现大学课堂

告密文化是中共统治下的特色，文革时期最严重。学生举报老师，孩子举报父母，夫妻、同事互相举报。中共为了一己专权，大搞愚民政策，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人人不寒而栗。那时候，在自家说话都得小心翼翼，



害怕“隔墙有耳”。

“六·四”以后，中共认为大学生是其专政的一大威胁，愈加严格控制。十八大前，高校将思想政治课开设为公共必修课，且课时多，学分重；2018年4月，中共教育部高调宣布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强化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的控制。为此，特给每位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师每月增加2000元工资！

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中共不允许老师在课堂讨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大学教授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政教授因披露中共党政人员每年耗资20万亿元人民币，被校方停止授课8个月后，于2018年8月被开除。

教材中淡化文革罪恶

2018年，适用于初中二年级

“长征”是逃跑还是北上抗日？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山河

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材里，所谓的“长征”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然而一个明显的事是，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南往西北逃窜，这是去打日本的样子吗？

失败逃亡

中共“长征”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军一方面进行了局部抗战，另一方面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期间，直接受苏联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共，却伺机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成立“国中之国”，前边抗日，他在后院放火，这样的抗日又从何谈起呢？

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由于“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对于后方对中共武装叛乱的围剿，不得不中断。

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一再地记述了中

共如何“欢呼”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1934年，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战术得当，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而到处寻找生存之地。

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只不过是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和撒下的弥天大谎。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

逃亡前的困惑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

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承认：“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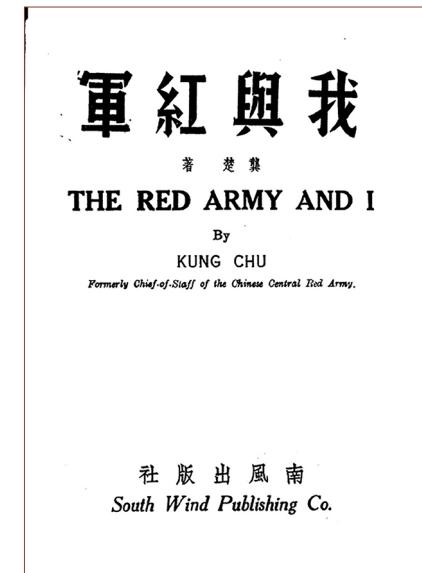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道：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事实上，就连这次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确的目的地，也是边走边看。

逃亡前的大屠杀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

留守中共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



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从背后用大刀砍杀。

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写道：“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当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江泽民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时，江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搔首弄姿。

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 13 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 1939 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了称谓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

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到：“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江上青的共产基因，对于江泽民有承传关系吗？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时日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 10 来岁的小孩子，论及江上青对他的影响，从何谈起？

《江泽民传》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
天

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包括伪造出身。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地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穿帮的“传记”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钢琴、吉他等。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的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

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



1998年7月3日，江泽民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突然弹琴唱起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取悦翻译女子。

“过继”时才1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着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在一起“绝食”呢？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

目击者张国焘的回忆

在逃亡中，中共中央红军不断向西南靠近，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由于国民政府军并没有给中共喘息的时间，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为了不被消灭掉，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记述道：“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

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对这个问题，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

当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时，发现毛泽东与张国焘会合之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

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中共

红军不得不一边维持生计，一边调整计划，“193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在陕北落脚，是地理形势使然。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易守难攻。

综合以上史实，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也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

结语

关于中共“长征”的这个历史性的谎言，在1949年后，通过报章、小说、戏剧、电影、话剧等宣传手段，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使得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不过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共想继续掩盖已是心无力了。

南泥湾“大生产”生产了什么？

作者 王世三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南泥湾大生产，“花篮里花儿香……”，但是，据中共党史研究学者揭露：花篮里飘出来的并不是稻香，而是罂粟花香。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们唱一唱……”，这首红歌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耳熟能详。但据中共党史研究学者揭露：花篮里飘出来的不是稻香，而是罂粟花香；三五九旅种的也不是粮食，而是鸦片。

毛泽东密令贩卖鸦片

1941年初，中共借新四军军部奉命北上之机挑起“皖南事变”，国共翻脸，国民党停止拨发经费，中共经费陷入极大困难。为了渡过难关，毛泽东密令财政厅长南汉宸做贩卖鸦片的生意。

延安时价，小米一斗125元（法币），鸦片一两1400元，延安时期，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1斤4两，以此标准计算，只需1000斤鸦片即可解决一万人一年的口粮问题。

当时，有人反对贩卖鸦片，1942年2月，毛泽东找来南汉宸，问他：“想听听你的意见，是继续



抽大烟的男子

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揣摩了毛的真实用意，回答：“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这条小路我们就得憋死，困死，饿死。”

南说的“明修栈道”是指运盐。毛泽东表示：“你的意见很好。”他拍板同意大量种植鸦片，两人畅谈了四个小时。

中共种鸦片卖给国统区有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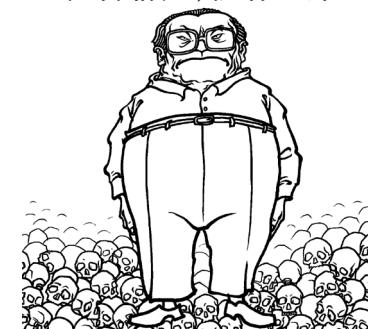
关于中共在延安种植鸦片并出售赚钱，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

“烈士”遗孤：最荒诞的遮羞布

根据《江泽民其人》改编 / 编辑 山河

读《江泽民其人》

乱世孤丑，汉奸戏子
拍马弄权，残暴贪婪
无能小人，为祸人间
无间枯鬼，随者亡焉！



江泽民的亲生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

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臭名昭著的两大汉奸作家。胡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从“汉奸长子”到“烈士遗孤”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钢琴。

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

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国人从未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烽火年代过来的人，江却有诸多“才艺”？

江泽民对于自己的出身自然是最重要的。为了能

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

江泽民就这么壮着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地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

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为“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现在在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有医生挨整，原因是诊断出导致大批人生病死亡的病因竟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

血写的历史与墨写的谎言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19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1/3，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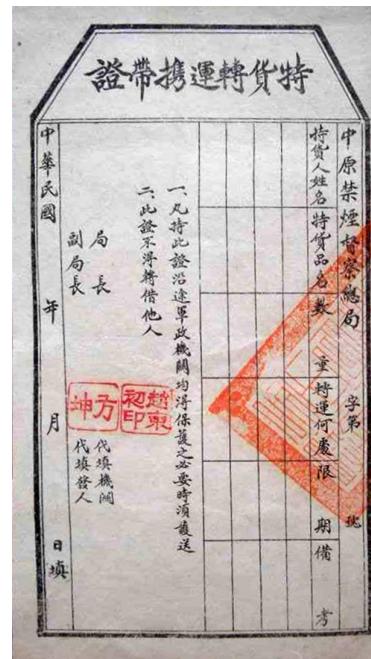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

“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邓宝珊，老同盟会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和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欠苏联外债为57.43亿元，而1959年财政支出就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的资金和粮食远大于还债金额。但是，长期以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中共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中共推卸责任的冠冕托辞。

天



中共“解放区”中原禁烟督察总局
特货（鸦片）转运携带证

夫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详实考证与记载。

《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弗拉基米若夫曾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

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快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

任弼时任鸦片专员

根据《延安日记》记载，中共还任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为鸦片专员。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份中共“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诺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摸了摸那为要显示自己党内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着一大片金黄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对斯诺说：“又

是一个丰收年啊！”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诺，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张思德死亡真相

人们都知道南泥湾三五九旅有个战士叫张思德。1944年8月，毛泽东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悼文。

官方档案显示，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韩家湾，佃农出身。1943年，担任毛的警卫战士。1944年，参加大生产运动，因窑洞塌方身亡。

张思德死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不仅为其召开了追悼会，而且毛还亲自出面发表讲话，称“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张思德并没有突出的战功和事迹，作为一个小小的警卫员，中共在其死后

如此高规格厚待，是极其少有的。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事实上，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的。鸦片通常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熟鸦片就是生鸦片经过烧煮和发酵后，制成条状、板片状或块状，通常包装在薄布或

塑料纸中。吸毒者吸食时，熟鸦片可发出强烈的香甜气味。张思德死亡的窑洞离南泥湾大概距离80公里。

中共为掩人耳目，参与烧制鸦片

的必须是“党性强”、“纪律性高”的人，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

抗战之前，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准备抗日，蒋介石发起了弘扬传统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开始严格施行禁烟运动。中共为了赚钱买武器与国民党打内战，竟将制毒贩毒合法化，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运往国统区毒害同胞。

那幅“为人民服务”的大标语，多年来一直悬挂在中南海的影壁上，成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中共最为经典的谎言之一。

天



“二号病”的由来

作者 谢天奇 大纪元 / 编辑 译竹

中共把三年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事实上，当年的水文地理资料表明并无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是“大跃进”酿成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场彻头彻底的人祸——而非天灾，被详实的史料揭示出来。

二号病：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

《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共汇编的内部报告指出：1958～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而忽略了这期间因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统计当时全国人口数量变化得来的，而是根据事实资料计算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疫办公室，把